

“荷兰病”是拉美经济转轨的主要障碍

董国辉

“荷兰病”^①是西方经济学界在最近10多年提出的一种新理论。它解释了初级产品出口战略导致畸变经济的问题。

所谓“荷兰病”，也称“科威特效应”，是指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在实施初级产品出口战略过程中，初级产品出口收入在该国出口总收入中占极大份额。这种情况所导致的汇率高估，阻碍了出口部门对其他部门（尤其是工业部门）的联系效应和诱导作用，损害了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妨碍了经济的多样化发展。

“荷兰病”是一种资源病，它虽然是在战后才被发现的一种经济现象，但却是拉美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主要病症。因此，笔者打算回顾拉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荷兰病”病史，即早期的初级产品出口战略使拉美“染病”以及后来的进口替代战略使病情加重的历史；最后来分析“荷兰病”是怎样阻碍拉美80年代以来的经济转轨的。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对美洲长达数百年的殖民统治期间，美洲殖民地经济完全置于宗主国控制之下，按照宗主国的需要来发展。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经济以农业为主，对外贸易集中在少数燃料、原料及能换取工业必需品的贵金属上。这些产品在美洲殖民地得以迅速发展，而与宗主国产品相竞争的则被严厉禁止，这就使西属和葡属美洲殖民地经济从一开始就处于单一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的畸形发展之中。

拉美主要国家获得独立后，单一初级产

品生产和出口的经济结构不仅未被打破，反而加剧了。到19世纪40年代，在英、美等西方资本的渗透和控制下，拉美各国以初级产品出口国的身份纳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向“中心国家”（以英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提供原料和工业品市场的“外围”国家。这种“中心—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拉美单一初级产品出口的经济结构，加剧了拉美对“中心”国家需求的依附性^②。

正是这种畸形的经济结构成为滋生“荷兰病”的温床。到20世纪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前夕，“荷兰病”给拉美经济造成的危害已相当严重。首先，由于经济发展偏向于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各国政治和经济生活都由控制出口命脉的上层分子治理并为其服务，而且由于上层分子在这些经济政策中获利，他们对“国家利益”或“一般大众”普遍漠不关心^③。这是当时拉美独裁政治盛行和政局动荡的主要根源之一。其次，由于单一经济结构，拉美各国多以初级产品出口为最终目标，对工业部门不感兴趣。这就阻碍了经济的多样化发展；即使建立了某些工业，也由于各国为初级产品出口

^① “荷兰病”的名称源于下述事实：20世纪60年代，荷兰在其大陆架发现了储量丰富的天然气矿床，开始大量生产和出口，造成荷兰盾的急剧升值，并引发了经济危机。

^② 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17页。

^③ 肖夏娜·B·坦塞：《拉丁美洲的经济民族主义：对经济独立的探求》，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1页。

服务的汇率高估政策而无力与“中心”国家的工业品相竞争。第三，由于初级产品出口供给的弹性系数低，加之“中心”国家的技术进步等因素，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呈持续下降的趋势。例如，从1873年到1938年，初级产品价格同工业制成品价格相比降低了43%^④。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拉美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对“中心”国家的依附性。正是由于这种依附性，拉美经济在19世纪才表现出一种“繁荣和破产”的循环往复。

到本世纪30年代拉美各国又面临着这种循环的“破产”周期。世界范围的“大萧条”一方面使拉美的初级产品出口锐减，年均出口收入由30亿美元减至15亿美元，无力支付工业制成品进口的费用；另一方面，“中心”国家因自身危机而中断了对拉美的工业品出口。这种局面使拉美的初级产品出口战略陷入困境，迫使拉美各国走上“进口替代”战略的工业化道路。

“进口替代”是一种通过限制特别的工业制成品进口来促进国内工业扩张的一种发展战略。它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以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经济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实施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基本特征是：利用各种保护主义政策（当然是借助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干预作用）促进国内“幼稚工业”的发展，工业生产则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为主要目标，因而这是一种典型的内向型发展战略^⑤。

进口替代战略在拉美主要经历了两大阶段：一是30年代到50年代末的初级进口替代阶段，主要替代生产非耐用消费品，如食品、日用化学品和纺织品等；二是60年代到70年代末的高级进口替代阶段，发展重点转到基础工业、动力、运输和基本设施部门，制造业从非耐用消费品生产扩大到耐用消费品、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的生产。经过近半个世纪的

努力，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实现了它所预想达到的大多数目标，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然而，从60年代起，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逐渐暴露出它内在的缺陷，给拉美经济带来许多消极后果。其一，为了使进口替代得以继续进行，拉美国家必须大量进口工业生产所必需的中间产品和资本货，到1980年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的进口约占拉美进口总额的86%，从而导致国际收支连年逆差。其二，进口替代的政策工具（汇率高估、关税保护等），使本国工业生产缺乏国际竞争意识，难以迅速发展。例如，拉美经委会的一份报告指出，拉美本地的制造业成本高于欧、美，而增值率只及欧洲的1/4和美国的1/7^⑥。因此，拉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并未提供更多的收入和就业机会，它所带来的只是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奇特现象。其三，进口替代所建立的企业多是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企业（在60年代进入高级进口替代阶段后更是如此），这种企业工资率较高且雇员较少，将大量剩余劳动力排斥在工业生产和市场之外，结果增加了国内失业的压力，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引起政局的动荡。

二

到80年代，这些内在缺陷导致的消极后果日益明显，而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更是雪上加霜，使拉美的进口替代战略走进了死胡同。自1982年起，拉美爆发了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使80年代成为拉美“失去的10年”。在这10年间，拉美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

^④ 保罗·贝罗赫：《1970年以来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58页。

^⑤ 本文所依据的划分内向型和外向型模式的标准，是世界银行的标准，即：一是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等保护措施的强弱；二是有效保护率的高低；三是出口刺激和奖励的大小；四是汇率高估的幅度。

^⑥ 同^③，第59页。

增长率仅为1.1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累计下降了8.3%，退回到70年代初的水平。整个拉美地区的外债总额由1980年的2303.58亿美元增至1989年的4159亿美元。资金外流总额10年累计在2000亿美元以上。^①

面对这种困难局面，拉美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开始寻求使其经济转入更加充满活力的轨道，提出了从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向出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转变的可能性。

出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是用非传统的出口品去替代传统的初级产品出口从而促进工业化深入发展的过程。这种战略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应量变动是物价和生产变动的根本原因，货币供应量则是唯一的政策衡量工具，必须抛弃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做法，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机制。发展中国家应当放弃人为高估的汇率，实行大幅度的货币贬值，这样能起到促进出口和自动限制进口（而无需政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作用，就能达到增加外汇收入和资金来源、促使国内通货膨胀与国际通货膨胀相一致的目的。所以发展中国家无需实行内向型的进口替代便能实现工业化，它们只需遵循自由市场、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的原则，采取非高估的汇率政策，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通过替代传统的初级产品出口便能实现工业化。因此，出口替代战略是一种典型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它的基本特征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出口部门的扩张，发展重点是以国际市场为依托的非传统工业部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仅限于货币供给领域，而无需实施保护主义措施。

从上述情况我们不难看出，出口替代与进口替代是以两种相互对立的经济理论作指导的，如果拉美要实现从进口替代向出口替代的转轨，将面临重重困难，因为拉美经济

中的“荷兰病”是实现转轨的主要障碍。在进口替代战略给拉美造成的消极后果中，我们已发现：初级产品出口战略所导致的“荷兰病”非但未被消除，反而由于进口替代的实施而加剧了。由进口替代加剧的“荷兰病”病症主要有：（一）进口替代的结果是继续依赖或更加依赖少数初级产品的出口，这是“荷兰病”的主要根源；（二）进口替代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的汇率高估是“荷兰病”的主要表现形式；（三）进口替代发展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企业的低工资率诱导的整个国家工资率偏高的现象，是“荷兰病”给经济转轨设置的最大障碍。

关于“荷兰病”阻碍拉美实现经济转轨的问题，笔者想从以下三方面来分析。

首先，进口替代工业化得以发动和持续进行的一个主要条件是必须大量投资。投资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靠国内积累，即提高国内的储蓄率和增加出口的外汇收入等；二是依靠外援或举借外债。然而，在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之前，国际金融机构极少考虑向拉美这类欠发达地区发放贷款或提供援助。因为它们一直奉行“部分准备金制度”（即银行所持有的闲置货币可少于其存户存款总额一定百分比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的中心信条是：“货币即债务”，因而各大银行总是将贷款大量发放给西方发达国家，认为只有这些国家才有实力保证按期偿还贷款。因此，在70年代以前，拉美依靠举借外债或外援来获得投资的可能性极小。这样，投资来源就仅剩国内积累了。拉美各国的低储蓄率^②使初级产品出口收入成为进口替代赖以进

^① 拉美和加勒比经委会：《统计年鉴》，1989年西文、英文对照本，第749~750、766~767页。

^② 例如，1970~1979年间，智利和乌拉圭的年均国内储蓄率分别为10.57%和8.32%，而大多数东亚国家则高达20%以上。

行的主要投资来源之一。换句话说,拉美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了进口替代战略得以持续进行的前提条件。而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由于相对缺乏自然资源,它们在经过战后最初10年的进口替代努力以后,由于外援和外部借贷的减少而被迫转入出口替代发展的战略轨道。因此,东亚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无需付出因初级产品出口剧减所产生的政治和经济代价,因为它们的这种出口是微不足道的。

拉美的经济转轨则不然。如果拉美国家要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替代,则必须纠正各项经济政策对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倾斜,这势必使拉美各国付出沉重的代价。一方面,这种转变将激起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反对,而控制这些部门的寡头要么就是控制国家政治经济命脉的上层人物,要么是与外国势力有密切联系的巨富。因此,放弃对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倾斜政策必然会导致国家政治局面的动荡不定。没有稳定的政治局面,拉美各国便不可能成功地实现转轨。另一方面,这种转变将引起国内投资来源的减少;由于国内投资来源的减少,拉美国家只好转而举借外债。这种情况正是拉美国家目前债务累累的深刻根源之一。沉重的债务负担既是拉美寻求经济转轨所付出的高昂代价,也是实现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其次,汇率高估是拉美国家现实经济转轨的又一个主要障碍。因为,如果拉美国家寻求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替代而与东亚相竞争的话,它们将面临大幅度的货币贬值。虽然货币贬值在某些情况下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拉美国家经济转轨所带来的大幅度的货币贬值却有百害而无一利。正如塞尔索·富尔塔多所说:“在拉美各国的经济中,由周期性危机造成的突发性的……货币贬值产生了若干后果。由于贬值是在出口价格下降

的时期发生的,因而抵销了出口部门收入的缩减,并通过相应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把实际收入方面所受的损失的大部分转嫁给整个经济。”^⑩同时,突发性的大幅度货币贬值也是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到80年代初,主要拉美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和秘鲁的通货膨胀率已达到3位数字。而80年代拉美经济转轨的努力更使其通货膨胀率呈恶性上升的趋势。就整个地区水平而言,1981年的通货膨胀率为57.5%,而后逐年上升,到1983年达到130.8%,1985年为274.7%,1989年则高达1161%。如此高的通货膨胀不仅抵销了居民收入的增加,而且也为拉美的经济转轨设置了很大障碍。

此外,进口替代所采取的汇率高估政策使拉美的工业部门缺乏国际竞争力,因而要实现向外向型经济的转轨更是困难重重。因为这种转轨要求拉美实现出口多样化,而多样化的出口,尤其是工业制成品出口将不仅面临发达国家的竞争,而且更要面临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的竞争。要确立竞争优势,拉美则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以智利为例,如果它想使其国内制造业有竞争力,那么急剧的经济转轨将使其2/3的工业企业消失,1/4的劳动力失业。这么沉重的代价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承受的。

最后,相对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而言,工资率偏高是拉美各国的普遍特征,也是“荷兰病”为经济转轨设置的最大障碍。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的实践证明,转向出口替代战略必须着眼于发挥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首先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使工业品在总出口中的比重大大高于初级产品的比重,这样才能逐步地向更高替代水平的工业发

^⑩ 塞尔索·富尔塔多:《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从西班牙征服到古巴革命》,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

展。在这样的工业发展序列中,始终保持低工资率是工业品确立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因此,拉美如果要从内向型经济转到外向型经济,则必须通过大幅度的货币贬值来实现低水平的工资率,因为这是拉美工业品确立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然而,在现实条件下,这种大幅度降低工资的办法是不可能成功的。例如,委内瑞拉是拉美工资率最高的国家,也是“荷兰病”最严重的国家。石油部门在国家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使委内瑞拉1970年的工资率(每小时1.07美元)比同年发达的日本(每小时1.06美元)还要高。因此,委内瑞拉为使其工业品具有国际竞争力所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以1965年为例,委内瑞拉工业部门的工资率为0.87美元,而韩国和中国台湾分别为0.07美元和0.11美元。那么,为了与韩国或中国台湾的工业品相竞争,委内瑞拉的工资率必须降到与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工资率相同的程度。如此大幅度的

工资下降,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拉美国家通过降低工资率来确立工业品的国际竞争优势,将使其朝外向型经济的转轨面临重重阻碍。

综上所述,虽然“荷兰病”只是战后才发现的一种经济现象,但它却根深蒂固地扎根在拉美经济发展历程中。它是拉美各国在19世纪推行初级产品出口战略的产物,但并未随着本世纪30年代以来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而消失,相反却构成了拉美目前实现经济转轨的主要障碍。

80年代拉美各国的经济转轨努力,目前看来主要还只是临时性的调整和稳定政策。拉美要克服“荷兰病”所设置的重重障碍而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则必须进行一场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深刻的改革。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

(上接第27页)

自80年代开始,墨西哥官方印第安主义理论便陷入主体意识混乱之中。在民族一体化理论遭到批评后,印第安主义便失去了方向,接受了多元主义理论。但是,在接受多元主义理论的同时,它并没有认真系统地分析这种理论的缺陷。恰帕斯的枪声应该使印第安主义清醒起来,根据墨西哥印第安人与整个社会所结成的历史和现实关系,重建指导和处理这种关系的新的理论。

试想,如果印第安人的政治权利得到解决,并感到满意,政府又大力支持他们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他们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那么,即使其经济和文化发展暂时还

处于落后状态,他们也不至于采取激烈行动;如果印第安人在国家和本州的政治生活中有较广泛的参与机会,并且有自己的自治市政府,他们也可以通过正常的合法权利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在和平和民主的基础上同国家与州政府商讨自己的问题,也许可以避免出现这种爆炸性局面。因此,这次恰帕斯冲突,至少可以向人们说明两点:一是墨西哥印第安人政治权利问题已经到了亟待解决的时候了;二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应该考虑引入民族政治的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